



革命的常识

孙振军时评杂文集

孙振军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弱者的失望
- ★ 嫖客掏出警官证
- ★ 副委员长与女影星之比较
- ★ 啥时建“老农民活动中心”



时评杂文集

革命的常识

孙振军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二〇〇二年十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革命的常识 / 孙振军 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 2002.11

ISBN 7-5059-4068-6

I·革… II·孙… III·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287 号

书 名	革命的常识
作 者	孙振军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责任印刷	邢尔威
印 刷	北京师大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5.312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4046-6/I·3164
定 价	26.00 元

恢复常识的革命

■ 郗烈山

当今中国是一个崇拜专家学者的时代,似乎学位、学衔的高低与本事、光荣的大小成正比。于是,“博士后”、“博导”颇具中国特色的成了最高级学位、学衔;于是,从北京到广州满大街都写满了卖假文凭的手机号码;于是,一些官员宁肯被人戳脊梁骨也要搞权学交易,混一个博士帽戴上……

想想公然鼓吹“外行就是要领导内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岁月,真是恍然如梦。

能说这是中国社会大进步的表现吗?我存疑。第一,举凡一件事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其合理性往往大成问题,就像一块硬币,从正面翻到反面,不仍是硬币一块吗?第二,如果高学位就是智慧的标志,欧美那些发达国家的领导人为何少有博士、教授出身的?鼎鼎大名的基辛格博士并不是美国总统而是总统的幕僚。布什父子俩虽出身名校,学历也就是本科。在科学技术与专业分工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专业知识与专门教育是不可轻视的,但治国还得靠通才而不是专才。道理很简单,正因

为专业知识越来越精细,任何人都不能样样专门精无所不知;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是良知与悟性,还有博采众长的胸襟。

这里所谓“政治人物”不仅是指那些手握权柄的统治者与管理者,也包括一切有志于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指点江山”的平头百姓和“激扬文字”的文化人。在这个意义上,试图继承“文人论政”五四传统的时评作者、以激浊扬清针砭时弊为己任的杂文家,则是最有自觉意识的平民政治人物。这些人学历不一定高,很可能不是什么专家,但是忠于生活直觉的他们,其眼光与见识却可能比许多大专家、大学者更高明,更接近社会的本真。因为当下的中国更需要的是直视现实的常识性判断而不是有意无意屏蔽和淆乱现实的高深学问。

我写上面这么一大堆话,是读孙振军先生的几篇文章激发的。孙先生拟把他近几年写的杂文、时评结集出版,让我写点读后感。他寄来的10篇文章,我先看块头最大的一篇,题为《诚信来自公信》。“诚信”是个时髦话题,社会上宣传、宣誓正热闹得一塌糊涂。我曾读过著名经济学家樊纲的文章《骗出一套新体制》。樊纲说:“其基本逻辑无非是:你想骗我,我也想骗你;你想骗我时我便想方设法防你骗,我想骗你时便要琢磨着如何让防骗的你防不着我的骗;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骗到最后大家一方面被骗得越来越聪明,另一方面也骗得累了,才发现其实谁都不是傻子,天生被骗而不会骗人;大家费了那么多劲你骗我我骗你还不如谁都不骗谁更省事、更合算、更经济一些(节省‘交易成本’),于是大家偃旗息鼓,制定一些共同防骗的规章制度以利于好好合作,人也显得诚实、讲信用、讲道德了起来。”樊先生的话当然很有道理,我完全赞成他关于诚信不能仅当作“美德”而应当作为一种制度的“产品”来看待的观点;但是他的这番话纯属纸上谈兵的理想化模式,根本不切合当下中国的实际。如今骗与被骗的主体是平等的关系吗?如果骗人的一方有恃无恐,气吞山河地说“骗了你又怎样?你有本事去告,告呀,告到哪里老子也不

怕”，还能“骗出一套新体制”来吗？而这样强横的骗子在现实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孙振军从生活经验出发，一针见血地指出，“诚信来自公信”。如果有权威制定和监督执行社会规则者本身不讲信用，没有公信力，民众的诚信是没有保障的，社会的诚信也不可能建立。显然，他的看法比“天真”的经济学家更接近常识更接近真理。

孙先生寄来的文章中最新的是《不能迷信张五常》。这个张五常目前正“红得发紫”。而孙文三言两语就揭穿了这个“假洋鬼子”信口开河的荒谬和丑陋。什么“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人的实际收入上涨了不少于二十倍”（他所谓的中国人显然不包括尚未脱贫的数千万农民和上千万的城市贫困人口）之类“歌德”的高调，固然不值得认真对待，他的那些先知般的预言又有几句经得起反驳？张说：“中国一入世，垄断与特权会遭受压力并逐步瓦解。”孙质疑道：阿根廷等国早八辈子就入世了，也没见他们“垄断与特权”瓦解。对当下兼有原始积累的野蛮与垄断经营的腐朽有切身感受的中国人，只要具有常识理性，都不会相信既得利益者会轻易放弃能聚敛财富的条件，不会相信不进一步推进改革，不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而仅凭入世就可以消除权力市场化所产生的“垄断与特权”。张五常说：“很多人认为农民大转移的时间可能会很长，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农民大转移很快就可以实现。日本明治维新和台湾地区的历史就是佐证。”他这种乐观的“鼓劲”之辞，可以在演讲会上赢得满堂喝彩，但蒙骗不了不愿受蒙的孙振军们。孙文以历史常识令人信服地说明“日本、台湾地区的历史不能成为我们的佐证”。

当然，孙振军先生的文章并不都是跟专家学者较劲的，他是心有所感则笔有所录，秉持一个正常的中国人的良知在观察现实思考问题发表意见。他的生活经历也许会影响他的视角和喜怒哀乐，但谁能因此而否定他的诉求的正当性与价值呢？比如，他的这10篇文章中就有5篇是为农民鸣不平并批评北京

人的优越感的(《别再拿“素质”来说事儿》、《噢,原来俺是跟着北京一块儿下的雪》等)。其中《农民哪儿去了?》说的是北京“申奥”成功后,中央电视台报道“北京沸腾了”、“中国沸腾了”,那些精心策划的欢庆场面却“忘”了九亿中国农民。这当然不是电视台的策划失误,而是中国现实的写照。农民的儿子孙振军对此这么敏感,使我想起今年4月初“天涯社区关天茶舍”(www.tianyaclub.com)上的一场论战。论战话题是,当一群民工带着大包小包与灰尘汗味挤上汽车时,满车人带着不屑;当他们为看到天安门而欢腾时,一些首都市民在抱怨,天安门关他们什么事?是啊,一个国家可以这样分裂成贵贱两个世界吗?不论有多少历史的和现实的理由,良知与常识告诉我们:这种现状就是歧视,是不公正的,是不人道的,是一点也不现代化的,是必须消除的中国的耻辱。

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评论文艺复兴运动时说:“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科学的胡说八道,一种比无知可鄙得多的胡说八道,居然僭称起知识的名号,而且对于知识的复兴布下了一道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为了使人类恢复常识,就必须来一场革命。”(《论科学和艺术》第一部分)当下的中国也需要这样一场使人们“恢复常识”的“革命”。我想,我们的杂文家、评论家正该为这场“革命”贡献自己的才智,还有情感。

(作者系《南方周末》评论员。本文发表于2002年8月5日《法制日报》、《今晚报》)

勤奋·激情·饭碗·成熟

■ 闲良臣

几天前,收到孙振军来信,说是要将他这两年半来写的时评、杂文、随笔结集出版,并说邀了几个人各写几句话放在书的前面。而这几个人中居然有一个是我。这令我有些惶恐。这么多年,我是从不为人写这类东西的,因为别的我都糊涂,惟有这自己几两几钱,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也就是说像写这类文字,自觉不配。而况他要我写的是“一篇公正性的文章”,越发让我为难。可看他来信那种坚决的态度,却之又不恭。因而在着难之后,就拿他做“引子”,写几句我想说的话。

认识孙振军已有两年了,若要说些好听的,那就是很勤奋,激情十足。认识不久,他就寄来一篇近3000字时评味颇浓的杂文,这就是被收在这集子里的《关于“假棉”案的三点随想》。我读了当时就叫好。可好有什么用?我不知在中国有多少好时评好杂文或好文章发不出来,甚至圈子里人有时说起来,也都明白,发出来的文章不能说都不好,但不少好文章发不出来,却是不争的事实。甚至可以说,越

是有胆有识的文章，存活率越低。但这次我还是想试试，真过不了“关”，我也无法。一般来说，领导说行就行，领导说不行，你也不要争——争也无用。再说，若是遇到开明一些的领导，你还可说出一点“不同的看法”，若是遇上蛮横的，你就只有闭嘴。我知道，在中国，离真的民主也不知有多远。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又有哪儿不是“谁大听谁的”呢？若有不听者，不，若有人“傻”，还想争一句，就有人要说“是我领导你，还是你领导我”，或者说“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能把你噎死羞死。其实，在中国，几千年来又何时有过不是“领导说了算”的呢？

——没想到孙振军的造化不错，领导不仅同意发，且在那稿件的空白处批了“写得好”几个字。拿着这有领导写，不，批的几个字的稿件，说来不信，也许是中国人世代奴才做久了，骨子里已经不自觉地就得了那奴才的“因子”，就像中国的奴才一见了皇上就想下跪，因而喜得我简直如同古人拿到了“恩准”的“圣旨”一般，文章终于可以上版了，并破天荒地让这篇文章占了我们这四开报纸的半个版面。事后想想，有了领导的“批文”，我就有了“胆子”，这是怎样的“精神状态”！

自那以后，孙振军就不断地有杂感寄我，我也不时地发出他一篇，但再也没有发出像上面提到的那样振奋人心的好文章。这怪不得孙振军，更不是他写不出来，而是因我编辑的版面上的文章一次又一次地“犯忌”，且还不时地吃一些有关部门“阅评”后的“通报批评”，因此我也只能一天天地变得更加谨慎起来，而审我提交上去的文章的领导也不能不把眼睛睁得更大，神经绷得更紧。尤其我知道，自己若是再不谨慎，“饭碗”就有可能被人砸了。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哀。在中国，几千年来，可说是亘古未变：端谁的碗，服谁管。有什么好法子吗？记得前两年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批评中国的知识分子，说是怨谁呢？自己“依附性”太强，也总想“靠近组织”，结果，弄到后来，不少人离了

“组织”，就只有死路一条。而那些凡是被打成“右派”的人也都是“在组织”的人。据说只有江苏有一位知识分子，解放后他因自谋生路而远离“组织”，也就逃过了那一劫。原本就是个无“组织”的人，你怎么好打他的“右派”呢？再说你打他“右派”又有什么用？他原本就不端你的“碗”，不吃你的“饭”，“打”得没来由吧。记得几十年前，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就听大人讲，一个人最坏的就是要吃饭，不然谁也管不着他。这真乃至理名言。一个人如果不需要吃饭，他就会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没有人还能说什么“我不给你饭吃，看你还有多大能耐”。所以说，有时想到这些，特别是有些人即便是打了“右派”，为了生存，也还是要找“组织”领一些“生活费”，那酸楚那难堪也只有当事人自知。即使是在又过了近半个世纪的今天，我依旧知道在中国，对一个人来说，“饭碗”是怎样地厉害，在不在“组织”，是怎样地重要。尽管自己一直幻想着有那么一天能端上自己的“饭碗”——哪怕做个小生意也成。然而时至今日，幻想还是幻想，甚至即便混到了外出打工谋生的份儿上，也还是在给“组织”打工……当然这也是中国的国情使然，我这里也绝没有埋怨中国那被打成“右派”的55万知识分子的意思。存在决定意识。如果说只有造就人的社会才能造就人；那么造就奴才的社会也就只能造就出奴才。这是没有好法子可想的。

但我虽然也知道孙振军的勤奋与充满激情，却没想到这么快他竟又写了这么多文章。只记得在我编的名为“百姓声音”的那个杂文、随笔的版面即将消失时，我编了他一篇要算是很好看的文字，也就是收在这本书里的《诚信来自于公信》。然而这次是他遇到的“时机”不好，因我刚刚又领到一份“阅评”后的通报批评（因为是在全省新闻界通报，孙振军也看到了。），因此我原以为没有什么“问题”的这篇文章也还是被谨慎的领导给撤了，并说也认为这是篇好文章，只是为了在最后这一两期，让这个版能有个“善终”吧。我没有话说。

更不怪领导。他们又何尝不是端着一个摇摇晃晃的“饭碗”呢？只要“在组织”，又有几个人不是端着这“摇摇晃晃”的“饭碗”呢？

我不想再说下去了。像我这样一个被人看作是“不成熟啊”的人，说出的话肯定也会是“不成熟啊”的。而一个“不成熟啊”的人的话也注定是不受一些人欢迎、甚至会被厌恶的。但我发誓：我永远也不会像某些人那样“成熟啊”。因为自己的认识是，如果像某些人那样“成熟啊”，倒不如永远“不成熟啊”的好，或说，我把有些人所说的“成熟”看作是一个人的耻辱。当然，我写的这样一则文字，估计会让孙振军失望的。但此时此地的我，实在写不出来别的好看的文字，也没有好心情去说些动听的话来，只有请集子的作者宽恕了

.....

（作者系《大河报》编辑）

2002.8.31

敏锐而淳朴的道德感

■ 焦国标

杂文作家是一群道德感格外发达的动物，孙振军先生则另有特点，那就是他的杂文作品里传达的道德意识更加敏锐和淳朴。所谓敏锐，是别人没有感觉到的他感觉到了；所谓淳朴，是凭中原人特有直觉说事论理，一事一议，不枝不蔓，不咬文嚼字，也不引经据典。我认为我是敏锐的，可是我发现有些地方振军先生比我更敏锐；我认为我是淳朴的，可是我发现振军先生比我更淳朴。他有一篇杂文叫《美国有几个部》，只有几百字，可却提出一个大问题，做了一个大对比。美国有 13 个部，一个直属局，总共才 18 名正部级干部；中国则有 3 署、8 委、28 部、36 局，外加众多的办、联、院、会，以致于光正部级以上的干部就有好几百名。这些信息都是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发布的，可是在读振军这篇文章之前，中国部长之多虽有所感，却从未感觉到美国部长竟如此之少，从未有如此惊心。

我在《中国文化报》做编辑的时候，就常常收到振军先生寄来的成叠的文章。当时我们并不相

识。他留给我的一个印象是用功甚勤,再一个印象就是文风淳朴,爱憎分明,独具慧目,直来直去,想到就说。看来的确如此,收入这个集子中的一百多篇作品,每一篇都放射出古道热肠的光芒。自古皆云“得中原者得天下”,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凭什么要这样说?是纯粹的地理原因吗?仅仅是说中原据“天下”心脏地带吗?过去从来没有细想,振军的文章隐隐约约给我一个关心这个问题的另外的回答,那就是,中原地区淳朴的人心、分明的爱憎、虽然潜在却最为坚不可摧的正义感,以及内心深处对人与人平等的渴望,是“天下”第一号最难攻克的堡垒,是任何貌似强大的力量都休想以非礼的形式使其归顺的最难以征服的地带。一言以蔽之,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实乃得“中原之心者得天下”之谓也!中原之心,淳朴而高洁,用我们河南老乡杜甫先生的话说,“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真想“批评”老孙几句

■ 潘多拉

老孙者，杂文作家、河南某报总编辑孙振军也。酒酣耳热之际，常以“中共一党员、海军退伍兵；立军功两次，受表彰多回，市级劳动模范、民选人民代表”自诩。此乃题外之话。先披露关于他《诚信来自于公信》一文的趣闻。

老孙先将这篇文章寄给北京的一家“主流大报”，该报的杂文编辑老拉刚好我认识。他大加赞赏，决定在杂文版的头条位置隆重推出。版面已经副总编辑签字，即将传版付印，不料总编辑将老拉叫到办公室（按分工，杂文版只需副总编辑把关），说头条文章必须大改。老拉恭候一旁，总编辑亲手持刀，逐字逐句斟酌、推敲、打磨、删改。半小时后，总编辑掷笔长叹：文章真是好文章，但矛头直接指向“上面”，我实在无法修改，换下吧。接着又随口问了句：“作者是干什么的，这么‘恶毒’？”

老拉哭丧着脸敷衍说：不太清楚，一个业余作者吧。心里苦笑道：可人家也是个总编辑呀！

同样是总编辑，一个能写出《诚信来自于公

信》这样的杂文，一个却擅长于将这种杂文枪毙，两相比较，意味深长。我不能说枪毙《诚信来自于公信》的总编辑有眼无珠，相反，我必须承认，他其实长着一双火眼金睛，一眼就看准了这种“恶毒杂文”的无限忠诚和特殊价值。也正因为嗅觉敏锐，目光如炬，动作神速，才能像足球场上守门员瓦解对方的一次又一次射门那样，将一篇又一篇“射”向报纸的“恶毒杂文”拒之门外，否则，他头上来之不易的司局级乌纱帽很可能朝不保夕。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和权利，老拉作为编辑也好，老孙作为作者也罢，都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一个报纸的总编辑为了刊登一篇“恶毒杂文”而承担“下课”的风险。

领导干部写杂文，在杂文作者队伍中算不上新鲜事。大致而言，领导干部与杂文的关系有三种。第一种，当领导之前写杂文，当领导之后就偃旗息鼓。第二种，当领导之前不写杂文，当领导之后，为了显得自己有文化、有品位，就涂抹起了杂文。第三种，当领导之前写杂文，时不时也能扔出一两支匕首、投枪，当领导之后改写以粉饰太平、解读政策、抒发人生感怀、讽刺小老百姓低级趣味为能事的文字。仅以反腐败这个常写常新的杂文题例，第一种领导，当官之前是老百姓，痛恨腐败自不待言，但自打当官之后，或与腐败不期而遇，或与腐败擦肩而过，或与腐败一拍即合，总之再也无法像以前当老百姓那样，痛恨腐败了，你还能指望他继续写杂文痛斥腐败么？（当然，也有少数领导，写杂文骂腐败比谁都厉害，写完杂文搞腐败比谁都在行，那是一种疾病，比“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还不可救药，不在本文议论之列）而第二种领导和第三种领导，无论自己是否与腐败有关系，或者有多大关系，他们写杂文一般有意无意地回避反腐败，即便涉及，也多半是为了对反腐败进行后现代式的“消解”，为了在杂文队伍中“正本清源”，挽救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看待社会，在写作反腐败杂文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存在着“根本性错误”的作者，把他们的杂文创作引导到他们认定的光荣、正确、充满希望的康庄大道上来。

明乎此,也许许多媒体的编辑、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都不会相信《诚信来自于公信》的作者会是一名领导干部,都不会信,一个年轻力壮、前途看好的人会写出这种苦大仇深、愤世嫉俗、难逃给什么什么“抹黑”嫌疑的“恶毒杂文”。老孙在《诚信来自于公信》中说,“政府如果不主持公道或主持公道不力,就是对不诚信者的一种默许与放纵……如此,不诚信的人或许会像瘟疫一样,越传越多、越传越广,最终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只有政府公信树立了,民众的诚信才有保障,才能回归。否则,只能进入骑驴找驴的怪圈”,分析得真是到位极了。他在另一篇题为《腐败三问》的杂文中连发三问:一问,反了腐败是政绩,产生了腐败是谁的责任?二问,对腐败问题为什么不追究到底?三问,是依法反腐,还是反腐时再依法?可谓刀刀见血,句句致命。文章最后,他还“别有用心”地搁下一句:“关于腐败,也许还可再有三十问、三百问,三千、三万、三亿问;但若先解决了这三问,也许腐败现象真能收敛一些。”若是一个自由撰稿人如此这般狂言无忌倒也罢了,老孙作为一名领导干部,难道就不怕有人给穿小鞋?不怕头上的乌纱帽戴不稳?不怕下届他所在的城市人大代表选举时莫名其妙地落选?不怕有人看不顺眼,突然以调查“经济问题”或“生活作风问题”为由狠狠地折腾他一顿?

真不知该如何评价孙领导与杂文之间的关系,也真想待下次再见到老孙时,好好“批评”他几句:“现在是太平盛世哟,注意点!”

(作者系《北京青年报》评论员。本文发表于2002年第9期《杂文月刊》)

答友人问

■ 孙振军

问：你为什么请鄢烈山、闵良臣、焦国标、潘多拉给你做序？

答：首先，他们都是很好的杂文家。让他们说言不由衷的话是很难的，可谓“匹夫不可夺志”。我最看重这一点。第二，鄢烈山、闵良臣生于五十年代，焦国标与我同岁，生于六十年代，潘多拉生于七十年代；他们又分别工作、生活在经济中心、政治首都和中原腹地，有一定的代表性。

问：你是从哪一年开始创作杂文的？文学创作的形式有很多种，你怎么对杂文如此执著了呢？

答：对我来说，用“创作”这个词太神圣了。我只是一名记者，是在不由自主中开始写杂文的。

问：读你的杂文，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直来直去，不绕弯子，语言也近似大白话，这和时下一些“高古”的文风大不同，若把你的杂文称作“平民化杂文”，你有异议吗？

答：用任何理论性的东西对我的文字进行概